

*L'écologie des autres: Anthropologie et la question de la nature.*  
Philippe Descola. Éditions Quæ 2011. 110pp.

李威宜 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

2012年獲得法國國家科研金獎<sup>1</sup>的人類學者 Philippe Descola (1949-), 長期致力於自然之社會化的比較研究。他於2011年發表的*L'écologie des autres – Anthropologie et la question de la nature* (《別人的生態學：人類學與自然問題》，Quæ出版社)，是對其學術思想一次扼要的說明。這本小書，儘管論述頗為抽象，但思考很有啟發性，對任何想了解西方人類學家不同生態思想理路的人來說，應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1970年代中Descola被Godelier (1934-) 說服，由哲學轉向人類學，進入亞瑪遜上游的Jivaro族進行田調，後在Lévi-Strauss (1908-2009) 指導下，於1983年獲得博士學位，1987年起專職任教於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 (EHESS)，發表有*La Nature domestique: symbolisme et praxis dans l'écologie des Achuar* (《家養自然：Achuar族生態觀的象徵與實踐》1986)，*Les lances du crépuscule: relations Jivaros, Haute-Amazonie* (《黃昏之矛：亞馬遜上游Jivaro族的關係》1993) 等作品，主編了多部文集，2000年當選法蘭西公學院 (Collège de France) 「自然人類學」講座教授。

2005年Descola發表了重要作品*Par-delà nature et culture* (《超越自然與文化》，依照世界各地民族對人與非人存在，在物理性與內在性上的相似與差異之不同組合，歸納出四大存有觀：自然主義、圖騰主義、泛靈主義與類比主義，並在此基礎上分析了六組基本關係模式：交換、掠奪、贈予；生產、保護、傳承，認為不同人群對這些關係模式不同的組合與偏重，構成了多種多樣的族群精神、慣習風格、集體行為。該著作發表之後，引起了廣泛

1 法國國家科研中心 (CNRS) 1954年起設立的學術成就獎，每年表彰一位對法國學術推動與國際影響具有卓越貢獻的學者。迄今為止的59位獲獎者中，有10位諾貝爾獎得主，2位菲爾茲獎得主。人類學領域獲獎者有1967年的Claude Lévi-Strauss，2001年的 Maurice Godelier。

的注意，也受到不少質疑，認為他對「自然與文化二元論」、「人類學的人類中心主義」的批判，過於注重結構分類的抽象模式，難免有凌空蹈虛之虞。<sup>2</sup> Descola或許是為澄清自己的思路，於2007年底2008年初，先後在巴黎、Dijon等地的INRA（法國國家農學研究院）進行了一系列講座，整體論述他對人類學發展過程中各種生態思想論爭的理解。這本小書就是由講座文稿與問答記錄結集整理而成。

在導言中，Descola從十九世紀中葉西方學術的建制談起，指出將自然與文化對立的二元思想（即Descola所說的自然主義）在研究方法與組織機制上的分疏，導致了自然科學與文化科學的分割，使研究物質現象與道德現象的中介情境變得非常困難，造成了地理學、心理學等學科的分裂。人類學也不例外，在十九世紀末分疏為體質人類學與社會文化人類學，遠離了學科發軔時探究人類一體性的初衷。而在社會文化人類學內部，又將世界分為普世物質規則和特殊價值系統，以此作為研究對象的內在屬性，再以闡釋二分與一體的關係為學科任務。對此，Descola指出，如果人類學繼續以上述二分前提為出發點，那麼這一整合任務就不可能完成。要跳脫這一困境，Descola重申了他在《超越自然與文化》中的基本主張，將自然與社會、人與非人、個人與集體，重組在一種新的集合當中，不再把它們分為物質、過程與再現，而是要理解為多元實體之間彼此互動生成的關係的建制化表達。為此，Descola邀請人類學放棄人類中心主義的大部分內容，借鏡生命科學與行為科學，進入一種關係的生態學。

正文論證，Descola首先在〈蛤蜊之爭〉（*La querelle des palourdes*, pp.13-29）中，回顧了1970年代Lévi-Strauss和Harris關於如何解釋北美印地安Bella Bella神話中蛤蜊虹管的不同主張，以及雙方展開的一系列論爭，<sup>3</sup>梳理了美國文化唯物主義的生態決定論與法國結構主義的心態論各自的思想脈絡，尤

---

2 參看2006年《人類》*L'Homme*（177-178期）發表的Jean-Pierre Digard與Philippe Descola的論爭。

3 Marvin Harris, 1976, Lévi-Strauss et la palourde. Réponse à la conférence Gildersleeve de 1972. *L'Homme* XVI (2-3), pp.5-22. Lévi-Strauss, 1976, Structuralisme et empirisme. *L'Homme* XVI (2-3), pp.23-38.

其是所謂自然在其中被賦予的決定性意義。然後，在〈人類學的二元論〉（*Le dualisme anthropologique*, pp.30-54）中，Descola借用Spinoza能動的自然（*nature naturante*）與被動的自然（*nature naturée*）這組概念，進一步分析唯物論與唯心論之間的異同，指出在表面的對立之下，自然與文化二分的自然主義其實構成了雙方共同的思維基礎，只是不同的人類學家會倚重其中的一方或另一方。透過對技術決定論（Steward, White）與文化主導論（早期Sahlins）、功能目的論（Malinowski）與調節論（Rappaport）、民族生物學（Berlin）與民族科學論（Sturtevant）等人類學觀點的檢視，Descola逐一討論了二元論給這些不同思路的人類學造成的理論困境。

在認識論層次的討論之後，Descola回到民族誌書寫面臨的一個基本問題：如何處置現代西方存有論與其他非現代存有論的相互關係（〈人各自然〉*A chacun sa nature*, pp.55-77）。首先，Descola指出人類學對此發展出了三大解釋方案：功效主義（*utilitarisme*），即以社會整合與生態調解等實踐活動的效能來詮釋觀念信仰等文化現象；理念論（*intellectualisme*），以非現代文化現象為特定歷史條件下趨近自然認知的準科學；人類中心論（*anthropocentrisme*），以宗教及其相應的世界觀為社會關係的反映與體現。而這三種思路歸結起來，其實都還是以自然主義存有論為當然判準。可是，自然主義之不可質疑，後果就是讓反省現代社會本身變得很困難。

有別於傳統人類學對現代主義與科學主義的反思，近二十年來超越自然主義成了許多學者努力的方向。在本書當中，Descola著重討論了現象人類學Ingold的棲居存有論，以及對稱人類學Latour等對現代性的解構，他所提出的批評特別值得我們注意。

首先，現象人類學取向是指，盡可能跳脫客觀主義去描寫人對社會世界與物理世界的混融經驗。因為貼近經驗，民族誌書寫會更逼真。但Descola指出，這種真往往只體現為對局部複雜性的捕捉，卻使整體的複雜性變得不易解讀。為解決這一難題，有的學者提出了一元論述，像Ingold在現象學與動物行為學的啟發下，提出的棲居存有論（*ontologie de l'habiter*），就認為應該把狩獵採集者與其環境的關係，重新定義為一種完全沈浸式的知覺與實踐

狀態，而這種棲居存有，他認為不是專屬於狩獵採集者，而是人類的一般情境，所以棲居存有論比現代西方存有論更能準確地描述人類活動。Ingold這一論點乃是當前生態人類學重要的思想資源。但Descola認為，這類論點，作為哲學宣告自有其正當性與吸引力，若作為人類學觀點，卻只不過是把原來西方中心主義對泛靈主義的偏見顛轉了過來。Descola強調，判定哪種存有論原則更本真，不是人類學的任務，人類學應當是要去理解所有的存有論——包括西方自然主義——，究竟是怎樣從全人類理應是共通的實踐出發，卻在不同時間、地點達成了各自的不證自明性（pp. 63-68）。

超越二元論的另一條道路，是從科學社會學發展出來的對稱人類學取向。<sup>4</sup> Callon和Latour由Bloor的對稱思路發展的這一方法，試圖挖掘一種深層的對稱性，他們採用民族誌方法，追蹤現代人在行動網絡中不斷創造自然與文化混合的中介現象，揭示出在實踐者（科學家、工程師、管理者）與其實踐對象（研究客體、機器、管理規章）之間彼此轉譯的事實。此外，他們拒絕承認有所謂「現代」大分界，只把現代人與非現代人的區別視為尺度和規模的差別。這種否認現代以超越二元的觀點，固然極有吸引力，但Descola指出，將集體差異定義為量而非質的不同，就無法說明具體實踐中，人與非人的特定組合形式是如何穩定化的。而事實上，這些集體形式並非任意或偶發的，不是通過協商產生再推展到網絡邊緣，而是人類對自己與世界、與自身的關係要賦予秩序和意義就必定採取的種種基本框架（pp. 68-71）。

很明顯，Descola的思考可說是一種對結構人類學的平反與修正。他認為，通常對結構主義的批判，其實只是將Lévi-Strauss等人漫畫為一種實際並不存在的抽象形式主義，而未曾深究人類經驗的集體形式中穩定化機制的普遍性與重要性，今日的人類學需要重啟這一問題，展開對存有界線劃定、價值系統、分類機制的思考。而Descola對自然人類學的倡議，正是這樣的一種嘗試。

---

4 Bruno Latour, 1991. *Nous n'avons jamais été modernes. Essai d'anthropologie symétrique*. Paris, La Découverte. (我們未曾現代過：對稱人類學芻論)

臺灣人類學大體已經走出功效主義、理念論等傳統路徑，不再尋求所謂社會、認知的根本原則，再把實際互動視為這些原則的體現，也不再使用某些大範疇——如社會、價值或再現等，去理解人與非人之間流動互涉的關係。但我們能否避免像Descola所批評的現象人類學那樣，陷入局部的細節深描，卻無法整體分析多元產生的原因？又能否反省對稱人類學的迷思，不再一味追蹤行動網絡無止境的增生轉譯，而是勇於探索差異多元之餘明顯存在的穩定機制？Descola這本法語小書，將思考放到了知識史與哲學思維的層次，應該會對我們有相當的提示作用。而他提出的以存有論與關係型態切入分析的自然人類學思路，更是大家必須認真面對的新穎學說。我們期待早日出現英文與中文譯本，讓非法語閱讀社群能夠認識此書的精彩論述。